

“免死金牌”为何时灵时不灵？

——中国古代“免死金牌”的前世今生

在周星驰版《鹿鼎记》中，吴三桂父子为争夺仅有的一块“免死金牌”反目成仇、丑态毕露。那块刻着“免死”二字的金牌，仿佛成了乱世中的救命稻草。然而，当镜头从戏台转向真实的历史长卷，“免死金牌”——或者说它更为正式的名称“丹书铁券”——却往往浸透着更为复杂的政治权谋与人世无常。它究竟是帝王的恩典，还是温柔的陷阱？是生命的保障，还是催命的符咒？



↑ 唐昭宗所赐丹书铁券，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1

从“丹书铁契”到“金书铁券”

我国古代帝王为酬庸功臣、安抚降臣，或推行特殊国策，会颁赐一种名为“铁券”的凭证。因最初以丹砂填字，故称“丹书铁券”；唐代以后有用银粉填字的“银券”，明代则出现金粉填字的“金券”。民间因其象征特权，尤其是常附带免死承诺，便形象地称之为“免死牌”或“免死金牌”。

铁券形制颇具特色，多呈覆瓦状或

筒瓦状，如同剖开的竹节，一分为二，朝廷与受赐者各执一半，需勘合验真。其上铭文内容通常包括受赐者的功绩、所获特权（如免死次数、子孙世袭爵禄等）及皇帝诫勉之词。这种制度最早可追溯至汉高祖刘邦。《汉书·高帝纪》载，刘邦平定天下后，“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庙”。这最初的铁券，更像一种荣耀契约，并未明确提

及“免死”，而是承诺功臣及其子孙可永享富贵。

然而，“丹书铁契”的庄严很快被残酷的政治现实击碎。韩信、彭越、英布等开国元勋相继被诛，所谓“世袭罔替”的承诺在皇权猜忌面前不堪一击。司马迁曾统计，汉初受封列侯者百余人，至文帝时仅存5人。汉朝的“丹书铁券”，其信誉值在血的教训面前，可谓大打折扣。

2

唐朝的铁券

唐代是铁券制度较为盛行的时期，其颁发的背景往往与危机和妥协相关，因而充满了戏剧性的反差。

唐德宗建中四年（783），泾原兵变，朱泚据长安反叛，德宗仓皇逃往奉天。大将李怀光星夜驰援，力战解围，功高盖世。然而，德宗听信谗言，竟不许李怀光入朝觐见。为安抚这位日益不满的悍将，兴元元年（784），德宗“加怀光太尉，增实食，赐铁券”，企图以高官厚禄和免死承诺笼络其心。

谁知李怀光反应激烈至极。他当使

者之面，将铁券掷于地上，怒喝道：“圣人疑怀光邪？人臣反，赐铁券；怀光不反，今赐铁券，是使之反也！”在他看来，无罪而赐免死牌，恰是皇帝怀疑自己将反的证明，这铁券非但不是恩典，反而是催逼反叛的羞辱。果然，李怀光不久即举兵反唐，最终于贞元元年（785）兵败被杀。这面未曾启用的铁券，成了君臣猜忌与信任崩塌的冰冷注脚。

同样是唐代，女皇武则天的铁券故事则关乎家族政治。圣历二年（699），年迈的武则天忧虑自己身后，李唐皇

室会对武氏家族进行清算。她于是命令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太平公主等李姓核心成员，与武攸暨等武家重要人物共同盟誓，誓言两家永结和睦，“铭之铁券，藏于史馆”。这份以天地为证、铁券为凭的誓约，看似牢不可破。然而，神龙政变后，武周政权垮台，中宗李显复位，武氏权贵，如武三思等虽一度凭借权术继续得势，但最终在激烈的政治清洗中几乎被诛戮殆尽。那份珍藏于史馆的铁券，未能挡住历史复仇的车轮。

5

免死牌为何常常失灵

纵观历史，获赐铁券者真正能凭其免予死刑的案例寥寥无几。其原因深刻反映了古代政治的本质。

首先是皇权的绝对性。铁券是皇权所赐，其解释权与执行力完全依附于皇权。

其次是政治的权宜性。许多铁券的颁发，源于帝王一时妥协或危机下的笼络，并非真心授信。唐德宗赐李怀光铁券即属此类。一旦危机解除或力量对比变化，这种权宜之计便可能被废弃。

再次是承诺的条件性。几乎所有铁券的免死条款都排除“谋反大逆”等十恶不赦之罪。这项帽子在专制皇权下具有极大的弹性和可操作性，成为帝王收回承诺的“万能钥匙”。

最后是世事的无常性。王朝更迭、政治风云变幻，前朝所赐铁券在新朝往往失效。武则天命李、武两家盟誓的铁券，在她身后便迅速失去约束力。

归根结底，“免死金牌”的神话，揭示了古代人治社会中一个根本性困境：当法律的权威屈从于个人的意志，当承诺的效力取决于权力的稳固，任何试图以有形凭证来固定特权、保障安全的努力，最终都可能被更高阶的权力碾碎。它如同一面历史的镜子，映照出权力场的无情、人性的复杂，以及在那套治理逻辑下，无人能真正超脱于规则之外的终极宿命。其“前世”是荣耀与恐惧交织的传奇，“今生”则成为我们反思传统政治文化中权力本质与制度局限的一个生动标本。

据《齐鲁晚报》

3

宋朝的“铁券”与“祖训”

宋代对“铁券”的运用，展现出更为复杂和多元的政治智慧，既有对前朝皇室的具体优待，更有对士大夫阶层的整体承诺。

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从后周孤儿寡母手中取得政权。或许是出于愧疚与安抚，他立下规矩，厚待周恭

帝柴宗训，颁赐“丹书铁券”，承诺柴氏子孙永享富贵，“有罪不得加刑”。赵匡胤基本践行了诺言：柴宗训善终，其子孙袭爵。乃至《水浒传》中塑造的“小旋风”柴进，其仗仗的家族底蕴和“誓书铁券”的底气，正是这段历史的文学投影。

更具深远影响的，是赵匡胤留给子

孙的一条“隐形铁券”——“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条刻在太庙誓碑上的祖训，虽非实体金牌，却成为两宋三百年间文人士大夫最有力的护身符。它极大塑造了宋代“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治文明，营造了相对宽松的言论环境。

4

明朝铁券与皇权的冲突

明代将铁券制度推向高度规范化。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大封功臣，颁赐铁券，明确规定公爵、侯爵、伯爵可免死的次数（如公爵免二死，子免一死）。其形制、尺寸、文书格式皆有定式，并详细镌刻功臣功绩与特权。

然而，明朝也是皇权极度强化、君臣关系最为紧张的时期之一。朱元璋晚年大兴“胡惟庸案”“蓝玉案”，株连

数万，当初获赐铁券的功臣，如李善长、蓝玉等，几乎无人幸免。铁券上承诺的“免死”，在“谋反大逆”的罪名面前形同虚设。所谓“所谓免死者，除谋反大逆”，皇帝拥有对何谓“大逆”的最终解释权，铁券的效力完全取决于帝王的意志。

明成祖朱棣以“靖难”夺位后，为酬谢功臣，也颁赐铁券。但得到铁券的功

臣，无一不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无人敢真的倚仗铁券肆意妄为。到了晚明，天启年间权阉魏忠贤势焰熏天时，也曾获赐铁券。然而，崇祯帝即位后，清算阉党，魏忠贤的“免死牌”未能带来丝毫安全感，最终在追捕途中自缢而亡。明代铁券的故事，清晰地揭示了：在绝对的皇权面前，任何形式的“免死”承诺都是脆弱且相对的。